



文化中国
天地日新

中国人的思想历程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我们中国一样，拥有三千年以上的学术传统而不中断。

黄山书社

中国人的思想历程

主编 | 林庆彰

本书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授权出版发行简体字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的思想历程 / 林庆彰主编. — 合肥 : 黄山书社, 2011.12 (文化中国丛书)

ISBN 978-7-5461-2473-5

I . ①中… II . ①林… III . ①思想史 - 中国 - 古代 IV .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5292号

中国人的思想历程

林庆彰 主编

出版人：左克诚

责任编辑：刘翔 石雅如 郑实

责任印制：李磊 赵彬

装帧设计：范晔文

出版：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230071

策划：香港三联书店北京工作室

发行：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010-65513628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010-61202350

开本：710×1050 1/16 印张： 25.25 字数： 328 千字

版次：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1-2473-5 定价：5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文化
中
国



天
地
日
新

总 序

林载爵

这一套“文化中国”丛书原来是以“中国文化新论”之名，于1982年10月在台湾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总共12册，将近4000页，约400万字。这套丛书讨论了10个主题，包括：文明的根源、思想、文学、科技、制度、经济、学术、社会、艺术、宗教礼俗。以118个题目全面性的讨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各个层面，组合成一幅比较完整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图像。撰写者一共96位，网罗了当时年龄约30到40岁的青年学者，反映了1970年代以来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的反省与思考，构成了中国文化再诠释的新篇章。这些学者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几乎都位居台湾学术界与文化界的重要位置，当年所发表的论点今天仍然具有新意，可以提供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视角。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在受到西方文化长期的冲击以及连带对传统文化进行无情的批判之后，好不容易终于体认到传统与现代是连续性的整体，不可分割断绝。因此，一部超越传统的论述，适合于当时处境与需要，又有系统的中国文化史论著，显得十分迫切。其次，中国文化在1970年代的华人世界需要重新被检视，而台湾则是一个恰当的

地方。台湾的学生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在大学又接受了西方式的学术训练，西方汉学家或台湾出身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文史学者，不断在台湾传播新的观念与思维，他们给台湾学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到1970年代，这样一批受到西方式现代教育熏陶，对传统中国文化又有新见解的年轻学者已经在台湾出现，成为台湾学术界的一股新兴力量，他们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自然有着不同的视野与不同的解释。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将他们集合起来，总体呈现一个全然有别于过去的中国文化的新观点与新解释。

于是，《联合报》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以他所设立的“文化基金会”资助了这个庞大的出版计划，目的就是要“提供一部丰富新颖、流畅可读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撰述者之所以以年轻一代的学者为主，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呈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三十年台湾文史教育的成果，并且深信年轻一代学者以其所吸收的西方知识、所接受的近代治学方法训练，必能对传统文化提出新的解释观点。

从历史背景来看，1975年是台湾思想发展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林毓生教授首度返台任教，开启了一批想要获得更精密的思想方式的青年学生的视野。他在这一年的5月发表了一篇长文：《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点燃了沉闷气氛下青年学生重探狂飙年代的兴趣，与领会思想问题的不同讨论方式。同年年底，余英时教授发表了《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文章中深入而前所未见的观点，让青年学生发现思想的新世界，这个世界辽阔无边，只要运用理智的思考与分析，加上一些想象力，便可展翅飞翔，一股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开始出现。

隔年，1976年，余英时在《联合报》副刊上陆续发表《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术发微》等文，为当时争论不休的“专制”问题提出了中肯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9月，余英时将上述文章及其他论著结集为《历史与思想》，由联经出版，这是余英时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产生极

分或类别。制度的一册里讨论了皇帝、宰相、监察、选举、考试、史官、地方行政、君主教育等官僚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并申述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与历代政治改革的理想。关于艺术一册的内容包括了美学思想、青铜、玉器、陶瓷、雕塑、书法、绘画、文人生活工艺品、建筑等重要部分。

这套丛书既然是以问题为主的研究，自然而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一则反映了年轻一代学者的主要关心所在，一则想透过新问题表达新的解释观点。以关于思想的两册为例，讨论了忠、孝、仁、礼、公、私、仕、隐、常、变等传统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并作了新的阐释；同时也提出了理想人格、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德治与法治、儒家政治理想、法理依据、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均富理想、管制与放任、道德自主与社会约束、道德与政治、自然秩序与人文秩序、自然观念等新问题，赋予传统思想新的意义。借着尝试提出新解释，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更能显现出来。

然而，新的解释观点并非凭空杜撰而来，在这一点上，这套丛书特别强调广泛利用前辈学者的杰出研究成果，以此为根基，再作进一步的发挥。因此，钱穆、萧公权、李济、徐复观、牟宗三、杨联陞、屈万里、全汉昇、刘若愚、陈世襄、李剑农、赵冈、劳榦、张光直、余英时等等许多前辈学者的优异著作，都随时被年轻一代的学者所征引。这种现象除了说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绝对肯定与尊敬外，更表示了处于变动之中的中国近代学术生命，在台湾的一脉相传，其意义自是无限深远。

尽管当时两岸隔绝，但各篇文章中，凡是论及根源，都运用了最新的地下考古材料来印证解说，根据最新的地下出土文物，分别从居址、器物、食粮、国家等方面，完整而清晰地描绘了八千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我们对先民活动起居的情形、食米（小米、稻米）吃肉（以猪为主的家畜饲养）的文明、上古社会形态的变迁、国家组织的出现，也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特别是提出“满天星斗”

为广泛的影响。

不论林毓生或余英时，在讨论问题时都不时引用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对台湾青年学生带来极大的刺激。此后，翻译现代思想名著成为几家出版社的共同志向，知识青年在这方面所表现的求智渴望，是1970年代末期台湾文化界极为突出的现象，这是一个思想燃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中，知识青年一方面向西方看，一方面又回望中国传统文 化，企图让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受到批判之后赋予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中国文化新论”就是这个组合的产物。

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也有其新颖之处。一般丛书的编撰，惯例上都是汇集单篇论文而成，这一次突破了旧有的方法，从开始就采取了以研究讨论为基础的共同参与方式。自丛书的主题、篇目，各篇间的相互关联，以至各篇文章的论旨，都经过每册作者讨论后才决定。初稿完成时，也经过切磋、问难，然后，再次修改定稿。所以，这套丛书并非过去旧有形式的论文集，而是具有主题、结构的集体创作。

有关文化史的研究，不论通史式的概述或断代式的专论，都不可避免的有其缺失。概述易省略其深奥与意涵，专论易疏忽其源流与发展。这套丛书则采取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完全根据问题的性质，或通贯而观，或断代而论。这种研究方式，保留了方法上的极大弹性，同时，也更容易彰显问题本身的性质，提出更周全的解释。以关于文学的两册为例，一册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间情爱的关注、幻想与神话，到智与美的融合，一共设计了六项我们认为能够充分表征中国文学传统的主题，给予系统性的解说，并讨论了文学的形式与意义、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另一册则分别就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宋诗、咏怀、咏物、小说、戏剧等重要的文学类别加以论述。两者配合，相信不但突破了旧有的文学史形式，而且更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内容。有关学术的一册，问题的选定则侧重每个时期的成就，从学术的萌芽到经学、注疏、理学、考据学，一一论列，以见学术的发展。关于制度与艺术的卷册则又注重各个不同的部

的上古文明的多元发展史观，更是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的了解。其他诸如讨论到地理环境、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人文思想、天下观念等问题的文章，也都能参证地下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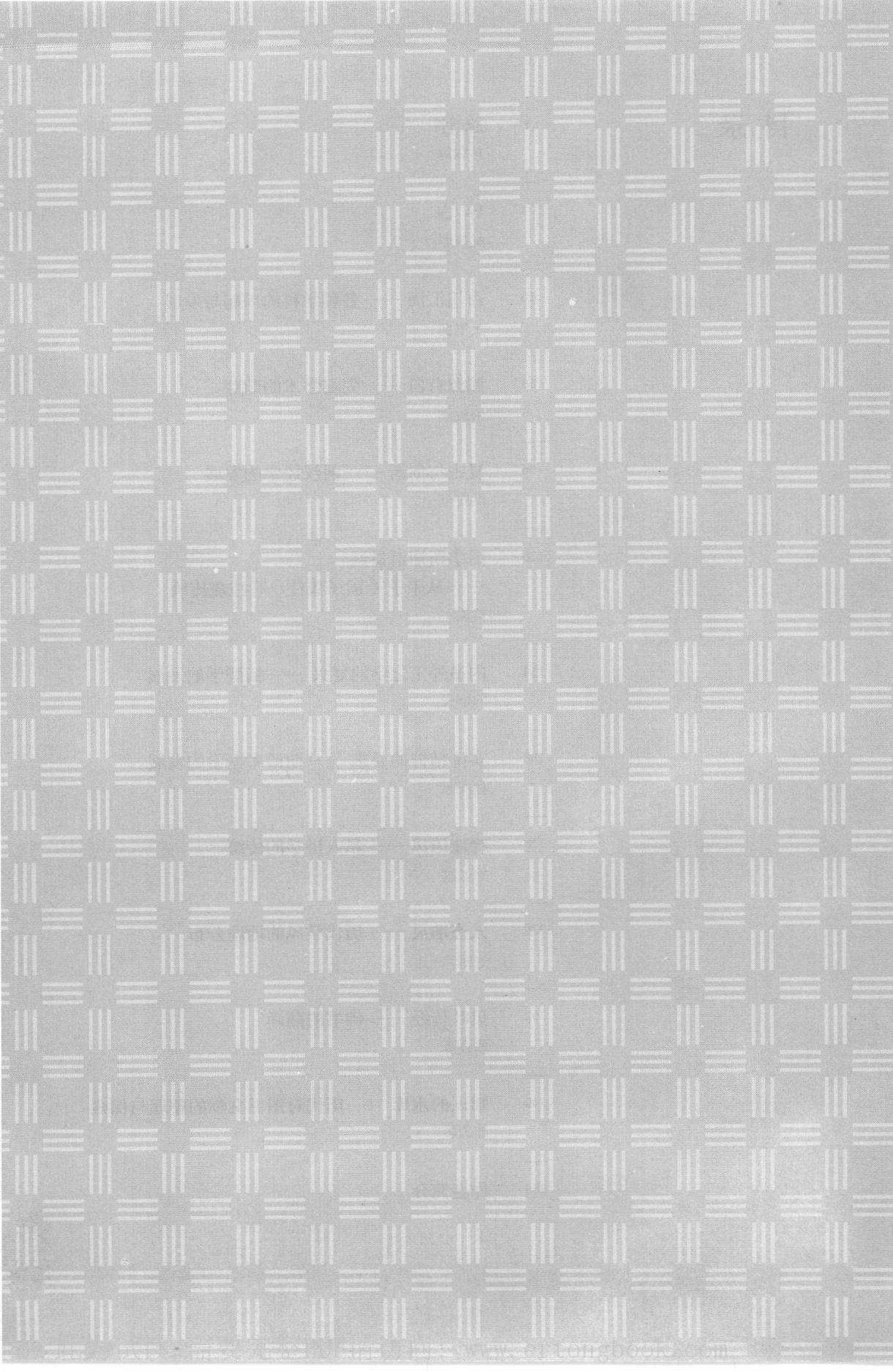
这套丛书自始即希望能涵盖较为广阔的文化活动层面。不可否认，近代历史教育过于偏重政治史，这使得历史教育的文化内涵，显得极其贫乏。这套丛书除了具备广为熟知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制度之外，更包含了以往较受忽视的社会、经济、科技、宗教、礼俗等层面。过去，对于中国科技史的了解，总是借助于英国李约瑟或日本薮内清的著作，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本与科技有关的专著，这也代表着年轻一代的科技史研究者踏出了一大步。在台湾，经济史是当时的一门新兴学问，年轻一代投入这项研究工作的，愈来愈多，相关经济的这本便是这些研究者所展现的成绩，分别从农业的自然环境、农业水利、新耕地的开发、土地分配、生产技术、商业、城市、货币信用、交通、海外贸易、财政税务等十一个方面，建构一部经济发展史。关于传统宗教，也选择了几个重要的问题来讨论。特别要一提的是风尚礼俗。近代以来，在对传统进行批判时，礼俗必定首当其冲，自命新派者，即清末所谓的“文明人”，弃之如敝履。然而，这套丛书中关于礼俗的则本着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探讨了祭祀之仪、婚丧之礼、长幼之伦、以及民间节庆、娱乐的文化意义，赋予这些传统礼俗一个新的文化生命，纳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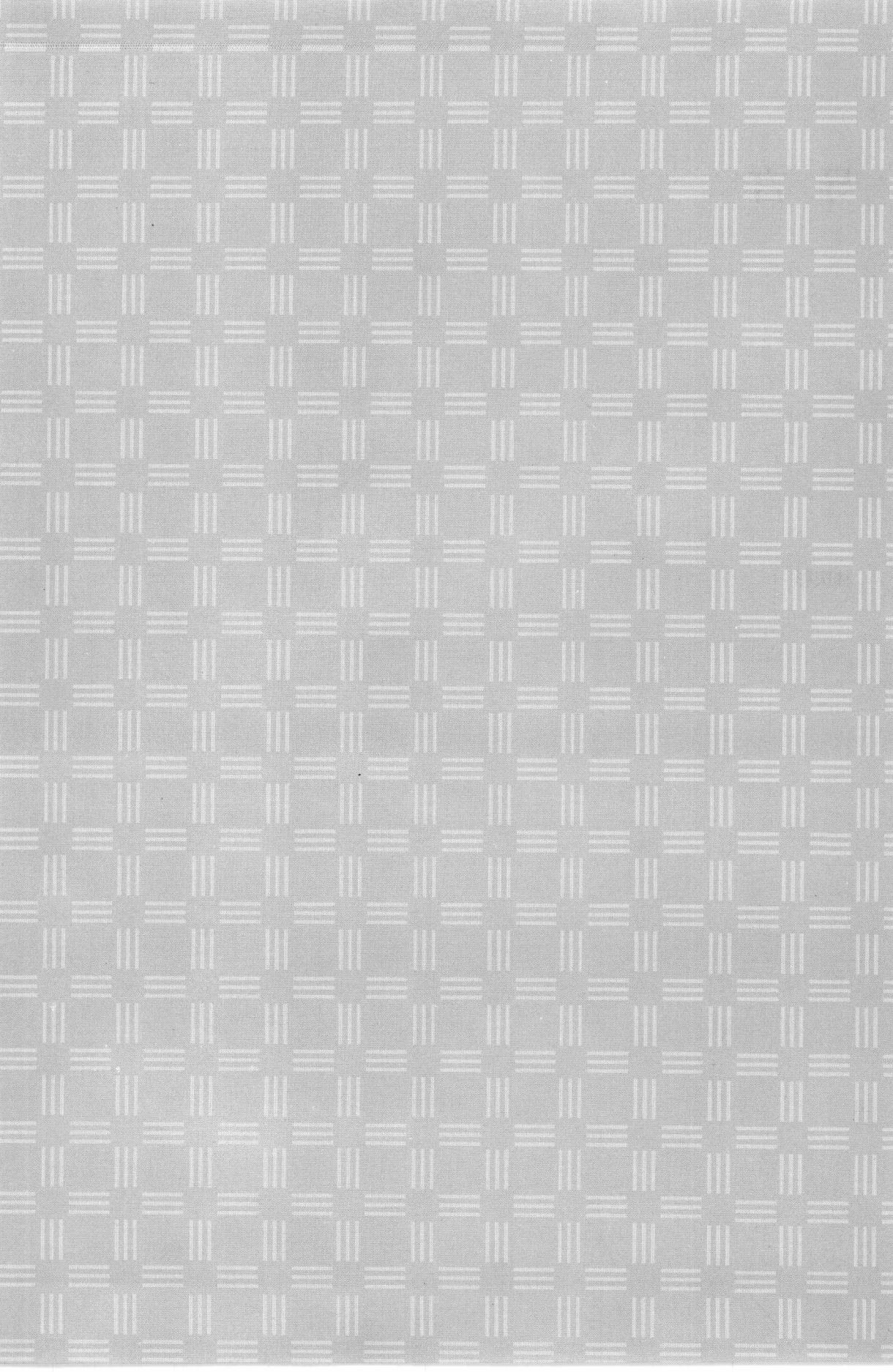
在简述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与内容特色后，作为当年的执行编辑，我非常高兴这套丛书在李安小姐的主持之下，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版，期待书中的观点能够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有所助益。

2011年11月

目 录

- i 总 序
林载爵
-
- 4 导 言
林庆彰
-
- 10 百川汇海——各种学科的兴起与发展
王国良
-
- 54 源源有自——先秦学术的萌芽
宋淑萍
-
- 96 复古与创新——两汉经学的发展
洪安全
-
- 126 旧学新知百贯通
——从朱子《孟子集注》看注疏传统
黄俊杰
-
- 154 内圣外王之学的复兴——新儒学的发展
陈郁夫
-
- 188 实证精神的寻求——明清考据学的发展
林庆彰
-
- 228 绛帐遗风——私人讲学的传统
李弘祺
-
- 270 人杰地灵——历代学风的地理分布
王明荪
-
- 302 贝叶传经——佛书的翻译
蓝吉富
-
- 340 知识的水库——历代对图书文献的整理与保藏
林庆彰
-
- 388 作者简介





导 言

林庆彰

我中华民族约有八千年的文化传统，即学术的发展也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三千余年的学术传统，宛如一浩瀚无垠的大海，海中蕴涵的即是我古圣先贤数千年来为克服自然环境，为解决生活问题，为探求人生奥秘，运用智慧的结晶。

如果将这三千余年的学术传统，作个比较分析，似乎有几点可提出讨论：

其一，历史悠久：当今世界，绝没有一个民族能拥有三千年以上的学术传统而不中断。欧西等几大强国，历史甚浅，姑不论矣，即埃及、巴比伦、印度等文明古国，或已如过眼云烟，或学术统绪早已中断，独我中华民族不但有三千年以上的学术传统，且能将这一悠久的传统用道统的观念来加以贯穿。

其二，含融力强：每当时代变局，或外来文化入侵时，即表现其强大的含融性。春秋战国时代南方学术文化的北移，魏晋六朝佛教的传入，都是如此，即近代西方学术东来，也莫不如此。其先或小有波折，然后经一段时间的涵濡蕴蓄，即与固有的学术融而为一。宛似盐之溶于水，水虽略带咸涩，仍不失其为水。

其三，人文的传统：殷、周之际，人文思想萌芽，至孔子集其大成。此后这一人文的传统，植根于每一思想家的心灵深处。由这传统，遂发展出与西方世界大异其趣的生命哲学。中国哲学所以有其历久常新的价值，端赖这人文传统的血脉贯穿其间。

其四，态度的保守：三千余年学术发展的方向，在先秦几已全部完成。汉代以后的学者，仅将先贤的学说加以推演阐释而已。推演的方法，即以注解经典来表达思想。不但对先秦的经、子书如此，即高僧注解佛典时，也莫不如此。这种保守性，说是传统学术的缺点，倒不如称它是一种特色。

其五，知识的偏枯：传统学者对知识的追求，每每受功名利禄左右，以悬为功令的经书，为终生之志业。遂演成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经书之外的学问，皆一无所用。历代之统治者也以治国之大道尽在

经书，其他技艺百工之业，遂不复加以措意。所以传统学术的发展，皆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科技则全凭个人的禀赋和兴趣，任其自生自灭，以致形成学术的偏枯现象。

其六，思辨的缺乏：知识的系统化，有赖条理的思辨能力。传统学者所注重的是成道、成德的内在修养过程，对于思辨能力的培养，一向不太注意。某一思想家提出一概念后，后代学者往往只知因袭引用，很难作进一步的突破。所以一“民本”概念，持续三千年，仍达不到民主的理想。这就是思辨能力不足所致。

因历史的悠久和强大的含融力，使传统学术显得博大精深；因人文的传统构成特有的生命哲学；然也因知识的偏枯，科技未能进一步发展；更因思辨能力的缺乏，使各种著作的内容粗驳杂沓。所以，晚进西风东渐，否定传统学术价值者有之，夸大传统学术功能者亦比比皆是。须知，过分夸大或妄自菲薄，心态虽有不同，其不足以了解传统学术，则并无二致。唯有平心静气地将固有学术作一客观的分析，让国人知所长短，然后汲人之长，补己之短，才是上上之策。本册10篇论文，即基于这个理想，以最浅显的笔法，对传统学术作系统的描述：

传统学术的内容既极为庞杂，典籍也浩若烟海，非沉潜有年者，实不足以明其统系。为让读者执简驭繁，先对其作全面性的巡礼实有必要。王国良先生的《百川汇海——各种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即因应这个要求撰述的。全文以目录学的观点来展现学术的丰富内涵，将目录学、经学、哲学、史学、地理学、语言文字学、文学批评、数学、天文学、医药学、农学等之起源和发展，作概括之叙述。各学科之经典著作，亦一一举出，让读者投石问路时有所取舍。

传统学术之发展脉络既明，即可由先秦至清末，将各代学术逐次加以论述。宋淑萍女士的《渊源有自——先秦学术的萌芽》指出先秦学术的关键完全操在巫觋、史官和士人手中，及封建瓦解，学术始渐及于民间。当时，数学、天文历法、气象学、地理学、化学、医学等自然或应用科学的知识也已萌芽；然最为发皇的是哲学。殷商时代敬

天、祭祖等的观念，就是春秋战国部分哲学家思想的源头。而诸子思想中以儒、墨、道、法四家最具影响力，遂就天人关系、人性论、人生问题、政治思想等，综述各家思想之演变与传承。而法家以最晚出，集春秋战国以来诸家思想之大成，造就了秦始皇大一统的帝国。

秦皇一火，先秦典籍残缺已甚，又因时空的变迁，汉代学者传经的工作也倍感困难。如何在汉初黄老思想的氛围中，拓展儒学的领域？如何将残缺的经典，恢复古来的面貌？如何在今古文之争中取得官方的认定？这都是汉代经学家经典重建工作的重点所在。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或以阴阳谶纬思想释经，或为迎合政治利益而曲加附会，此乃复古过程中的歧途，或可称为创新。洪安全先生的《复古与创新——两汉经学的发展》，即在论述这数百年中经学家解释经典的种种历程。在这崎岖的历程中，他们传下了古代经典的香火，也为后代学者以疏解经典来寄托思想的方法立下了典范。

历代学者既以疏解经典来寄托思想，则由汉代至清末这二千余年的古典解释史中，绝大多数学者于注解经典中每每兼有熔旧学、铸新学的愿望。由兼熔新旧的过程来建立思想家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成为我国传统学术的一大特色。黄俊杰先生的《旧学新知百贯通——从朱子〈孟子集注〉看中国学术史上的注疏传统》，以为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最能代表传统注疏因袭和创新的一面。而将其中的《孟子集注》作量化分析，指出其因袭的一面。因袭乃在融旧，融旧又所以创新。朱子创新的一面，即在其“理”、“气”二分观念的提出，和“天理”、“人欲”观念的建立。再由融旧与创新的过程中，证明朱子注解《四书》仅是他表达思想的手段，其真正目的是在建立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

自六朝、隋唐以来，道、释并兴，儒学浸微，读书人陷溺于佛老，民族思想和君臣大义也日渐泯没。如何重振儒家思想，并恢复安定的社会，已成为唐末以来新儒学家的重要课题。陈郁夫先生的《内圣外王之学的复兴——新儒学的发展》，即在阐明新儒学家如何在这种大

责重任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各家思想由南宋的朱子集其大成。同时，陆象山开心学一派，至明代王阳明完成体系。此时，王学末流也因戕害人心，备受攻击。近八百年的新儒学，至清代戴震时，遂没入考据的洪流中。

在晚明反对王学空疏的运动中，读书人逐渐转入知识层面的探讨，由晚明的博杂学风，转入清初的经典辨伪，再变为乾嘉时代文字与典制的考订。最后在西风东渐中，读书人为救亡图存，转而关心时务，考据学遂由盛而衰。拙作《实证精神的寻求——明清考据学的发展》，在历史性的叙述中，举例证明考据家如何发挥“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的精神，并指出其对文献整理的贡献。然也因考据家好古的观念，影响了科学思想的发展；更因执著于“训诂明则义理明”一观念，滞碍了哲学思想的进步。

上述六题略论三千余年来各代主要学术之发展，然学术之统系，固非断代之叙述所能完全涵盖，故另立四题综论学术史上之重要课题，以收相辅相成之效。

历代以来知识的传播，往往由官学推动，然有赖于私学者实多。自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至清末的两千余年中，在官学的竞争下，私人讲学也负起了教育下一代，达成传播学术文化的责任。李弘祺先生的《绛帐遗风——私人讲学的传统》，叙述由先秦至清末私人讲学的发展与演变。尽管私人讲学的方式有寺院教学、习业山林、书院教育等不同，然以经书为主的讲学内容，和希望成知成德的教育目标始终不变。这是私人讲学所以伟大的地方。

在学术发展的历程中，某些地域人才鼎盛，有些地区则人才凋零，将这种地域分布的现象，加以分析研究，以探索学风演变的趋向，这是王明荪先生《人杰地灵——历代学风的地理分布》一文的主题。就分析统计的结果，分布的趋向大抵是由北方而长江流域而东南。在几个阶段的转变中，两汉以前的学术重镇在北方，魏晋时期长江流域逐渐走入舞台，唐代时重心南移，宋代以后东南半壁人才辈出，蔚为全